

美中臺三角關係： 改良的戰略三角分析法

The US-China-Taiwan Triangle:
An Improved Analysis of Strategic Triangle Approach

沈有忠 (Shen, Yu-Chung)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講師、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 要

一直以來，從國際面向來討論兩岸關係免不了要考慮美國的角色。不只是因為美國的態度直接影響臺海穩定與否之外，也因為美國的主動介入將可以改變現況，並製造新的均衡。因此，臺、美、中三角關係成為研究兩岸關係相當重要的分支，也是研究國際關係中穩定、衝突等議題的實證個案。探討兩岸關係的理論途徑相當豐富，其中，羅德明教授 (Lowell Dittmer) 的戰略三角分析途徑即為重要的理論之一。本文以戰略三角分析法為對象，除了回顧既有的以戰略三角為基礎途徑的分析文獻之外，也將討論這個途徑在兩岸關係研究上的適用性，並且提出模型上的修改，以增加戰略三角途徑在分析個案上的解釋能力。

關鍵字：兩岸關係、戰略三角、臺北、華盛頓、北京

壹、前言—兩岸關係的研究現況

兩岸關係的研究在八〇年代後期出現第一次重大的變化，主要是因為相較於內戰時期的武力衝突，兩岸分別採取較為開放與多元的政策，試圖作進一步的交流。對中國而言，隨著鄧小平時期「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基調確立，加上改革開放後經濟迅速的成長，對臺灣的政策從以往的武力兼併與消滅，轉變為接觸與統戰。對臺灣而言，隨著政治上的解嚴與民主化，政治競爭使得各種兩岸論述開始群起爭辯，而基於人道的立場與務實的考量，更使得國民黨政府決定在1987年開放大陸

探親，並逐步規劃與中國進一步的接觸。在這樣的氛圍下，兩岸關係朝向日益複雜，而且兼具多種面向來發展，也因為如此，對於兩岸關係的研究也因為現實的需要與材料的豐富而迅速膨脹。在日益繁瑣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兩岸關係的研究極其複雜，這是受到以下幾個原因所影響。首先，議題多元而且彼此關係緊密。這是因為兩岸關係牽一髮而動全身，以往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兩岸只有衝突沒有正面交流，但現在的情況是政治上非正式對話的展開，而經貿、文化上的接觸更相當緊密，而且彼此相互影響。其次，兩岸關係的行為者不只兩岸。這是因為即使冷戰格局瓦解，但美國在亞太戰略安全部署上，兩岸關係仍舊是重要的變數，因此美國甚至日本對兩岸關係的介入，也都會影響均衡的維持或發展。第三，兩岸關係敏感而且變化迅速。這是因為雙方在缺乏制度上的交流與對話之前，彼此調整政策的空間都很大，只要有些許言論上的刺激，就可能扭轉情勢，將兩岸關係帶往新的方向。最後，兩岸關係涉及多層次，這是因為兩岸關係不只是討論彼此交往的情況，更是影響兩岸各自內部政治發展的變數，而全球化之下，兩岸關係更是國際體系中備受矚目的議題。由此可知，兩岸關係不但議題廣泛，而且十分複雜，在研究上不但有主題的現實性，有時也需要在理論上與其他的研究對話。

在眾多的研究之中，吳玉山教授歸納了兩岸研究途徑為三個面向（層次），十種途徑¹。這三個面向分別是國際環境、國內政治以及兩岸互動。在國際環境面向中的研究途徑注重兩岸關係在國際大環境中所受到的制約與牽引，裡頭包括了戰略三角，例如包宗和²、吳玉山³；國際體系，例如明居正⁴；與認知模式，例如袁易⁵等三種途徑，當然也包括側重在國際衝突與合作上的討論，例如羅致政的戰略模糊⁶、裘兆琳的美國亞太利益計算⁷等等。其次，國內政治則是希望瞭解兩岸各自內部的決策背景與邏輯，來討論兩岸關係的變化，包括了選票極大化帶來的政策趨中效應，例

¹ 關於這十種途徑的應用，請參考吳玉山，「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收錄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出版社，1999年），頁3-35。

² 請參考包宗和，「戰略三角角色轉變與類型變化分析」，收錄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出版社，1999年），頁337-364。

³ 請參考吳玉山，*抗衡或扞從*（臺北：正中書局，1997年）。

⁴ 請參考明居正，「國際體系理論與兩岸關係」，收錄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出版社，1999年），頁365-388。

⁵ 請參考袁易，「安全典則與美中關係」，收錄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出版社，1999年），頁389-432。

⁶ 請參考羅致政，「美國戰略性模糊政策對兩岸互動的影響」，*東吳政治學報*（第6期，1996年），頁175-202。

⁷ 請參考裘兆琳，「柯林頓爭取國會給予中共『永久正常貿易關係』之策略分析」，收錄於裘兆琳主編，*中美關係專題研究：1998-2000*（臺北：中央研究院，2002年），頁37-80。

如John Fuh-Sheng Hsieh⁸、吳玉山⁹；國家與社會典範途徑，例如冷則剛¹⁰；以及政治心理學，例如石之瑜等三種途徑¹¹，另外，也有從兩岸各自的決策模式與領導來進行討論，例如柳金財、蔡瑋、寇健文等等¹²。第三，在兩岸互動的面向上則注重兩岸的交流與互動，主要的應用理論有分裂國家模式，例如張五岳¹³；整合理論模式，例如張亞中、高朗¹⁴；以及大小政治實體，例如吳玉山¹⁵等三個途徑，其他當然也包括了兩岸的談判比較，例如邵宗海等等¹⁶。除了這三個面向之外，理性抉擇中的賽局理論則是跨越三種層次的一個分析工具，分別可以被不同途徑所應用，主要的研究者包括包宗和¹⁷、Jih-wen Lin¹⁸、Benson and Niou¹⁹、吳秀光²⁰、林繼文與羅致政²¹等。

⁸ See, Hsieh, John Fuh-Sheng, "Chiefs, Staffers, Indians, and Others: How Was Taiwan's Mainland China Policy Made?" In Tun-jen Cheng, Chi Huang, and Samuel S. G. Wu, eds. *Inherited Rivalry: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Lynne Rienner, Boulder, Colorado, 1995, pp.137-152.

⁹ 吳玉山，「臺灣的大陸政策：結構與理性」，收錄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出版社，1999年），頁153-210；吳玉山，「臺灣總統大選對於兩岸關係產生的影響：選票極大化模式與戰略三角途徑」，*遠景季刊*（第1卷第3期，2000年），頁1-33。

¹⁰ 請參考冷則剛，「大陸經貿政策的根源」，收錄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出版社，1999年），頁210-264。

¹¹ 請參考石之瑜，「芝麻！開門 心理分析引領兩岸政策研究進入新境界」，收錄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出版社，1999年），頁265-336。

¹² 請參考柳金財，*大膽西進？戒急用忍？：民進黨大陸政策剖析*（臺北：時英出版社，1998年）；蔡瑋，*中共的涉臺決策與兩岸關係發展*（臺北：風雲論壇出版，2000年）。

¹³ 請參考張五岳，*分裂國家互動模式與統一政策之比較研究*（臺北：業強出版社，1992年）；張五岳，「分裂國家模式之探討」，收錄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出版社，1999年），頁77-118。

¹⁴ 請參考張亞中，*兩岸統合論*（臺北：生智，2000年）；高朗，「從整合理論探索兩岸整合的條件與困境」，收錄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出版社，1999年），頁41-76。

¹⁵ 同註3。

¹⁶ 請參考邵宗海，*兩岸協商與談判*（臺北：新文京開發，2004年）。

¹⁷ 請參考包宗和，*臺海兩岸互動的理論與政策面向*（臺北：三民書局，1990年）。

¹⁸ See, Lin, Jih-wen, "Two-Level Games Between Rival Regimes: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Remaking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sues and Studies*, Vol.36, No.6, 2000, pp.1-26

¹⁹ See, Benson, Brett V. and Emerson M. S. Niou,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Dependence, and Peace: A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at 2004 Annual Meeting of Chinese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Tainan, Sep. 18, 2004.

²⁰ 請參考吳秀光，「兩岸談判之結構分析」，收錄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出版社，1999年），頁119-152。

²¹ 請參考林繼文、羅致政，「零和或雙贏？兩岸經貿交流新解」，*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10卷第1期，1998年），頁33-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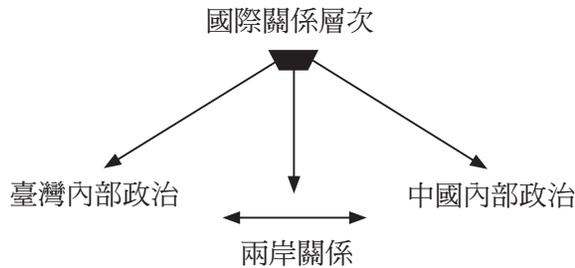


圖1 兩岸關係理論的三個層次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當然，在這三個層次之外，也有針對特定議題進行較為微觀的討論與研究，例如童振源從全球化為切入點觀察兩岸的經貿關係，並據此推論兩岸在經貿全球化的脈絡下利益緊密結合的關係，將使中共不容易用經濟制裁來作為對臺政策的槓桿²²。鄭永年、吳叡人、李廣鈞、汪宏倫、林佳龍、江宜樺、吳國光、王飛凌等兩岸的學者，則從民族主義的觀點比較臺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在兩岸問題上的投射。儘管這些學者對於兩岸民族主義的解釋有高度差異，但彼此也都同意兩岸各自對民族主義的操作與形成，確實正在扮演兩岸關係中重要的變數²³。高長則是細緻分析兩岸的經貿往來，認為兩岸在經濟市場的互補性高、而經貿交流的網絡也日益深化，是一股難以抵擋的趨勢，也被期待效果外溢到政治議題上來²⁴。

在眾多途徑之中，各自有其分析上的特徵與關注的變數，彼此相互補充，也都各有缺漏。在不同的領域中，分析的行動者各有所異，國際關係經常以國家為行動者，兩岸互動則分析兩個政府角力的過程，而國內政治則是研究個別社會中具有影響決策能力的人、團體或階級作為分析的對象。由於兩岸關係複雜而多元，要用單一理論來解釋所有面向是極為困難的，因此個別理論的存在互補對方之不足，提供了兩岸關係認知上較為周延的可能。

由以上簡單的回顧可以發現，兩岸關係的討論內容與方法極其多元與多變，如果要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必須在研究的方法和範圍上先有所說明，否則不容易聚焦，也不容易在理論脈絡中定位。基於此，本文有必要說明後文的討論是以國際關

²² 請參考童振源，*全球化下的兩岸經濟關係*（臺北：生智，2003年）。

²³ 請參考鄭永年，「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收錄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年），頁365-388。

²⁴ 請參考高長，*兩岸經貿關係之探索*（臺北：天一圖書，1997年）。

係層面中的「戰略三角」為理論運用上主要的對話對象，將討論的脈絡縮小在戰略三角的研究途徑中，除了介紹戰略三角的理論途徑外，也討論從理論原型出發的各種不同應用。此外，本文也將對戰略三角的途徑是否適用於兩岸關係做初步討論，並且針對這些討論提出一個改良式的戰略三角分析方式，除了希望能增加對兩岸關係的解釋力，也希望能增加理論的通則性。最後，本文也試圖評析戰略三角理論作為解釋衝突、穩定等議題的分析工具上可能的優缺點。

貳、戰略三角的理論緣起與應用

戰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的研究源自於冷戰時期美、中、蘇三邊既抗衡又合作的歷史經驗。受到冷戰結構的影響，三邊互動的模式成為戰略三角理論所關懷的核心。自從Lowell Dittmer以模型提出戰略三角的理論架構以來，國際關係中應用戰略三角來解釋三邊關係的討論就越來越多，雖然大部分集中在討論美、中、蘇的三角關係，但事實上，臺、美、中的三角關係也相當適用於此一研究途徑²⁵。由於兩組戰略三角都包括了美國與中國，因此兩組戰略三角的互動相當密切。這兩組戰略三角的關係上，由於冷戰時期是一個以美、蘇兩強對立為特徵的兩極體系，因此美、中、蘇的三角關係對於冷戰體系的影響比臺、美、中三角關係更為重要，一直到1992年蘇聯瓦解之前，美、中、臺的小戰略三角，一直受到美、中、蘇大戰略三角的制約。1992年蘇聯瓦解帶來的衝擊意義是，莫斯科失去與美國抗衡的對等力量，不再扮演國際上超強的角色，連帶使得大三角的結構瀕臨崩解，小三角的獨立性也隨之浮現。

大三角的瓦解對小戰略三角具有重大的意義。在過去華盛頓對於中國大陸的政策是由美國對抗蘇聯的戰略需要來決定。現在蘇聯解體，大戰略三角消失，華盛頓對北京的態度就轉由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內在因素來決定，於是安全問題、貿易問題、意識形態問題、西藏問題等矛盾一一浮出檯面。北京在失去了和華盛頓共同對抗蘇聯的戰略利益後，中國的國際地位顯然有所跌落，在這種情況下，華盛頓不需要那麼顧忌北京立場，來壓抑和臺灣之間的關係。而小戰略三角也就自此擺脫大戰略三角的制約。

以上是對戰略三角研究途徑的緣起做簡單的說明，在實質進入戰略三角的應用

²⁵ 事實上，戰略三角的概念在1960年代即已經被提出，主要也是應用在美中蘇的三邊關係上。而更以前，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中國共產黨與美國、蘇聯的戰略三角競合關係就已經存在。See, Carver, John W.,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entice Hall, New Jersey, 1993, p.34.

與討論之前，先對這個理論使用上的條件做說明，以釐清理論適用範圍。戰略三角在應用上有三個前提條件：1.戰略三角關係成立，必須有三個主權各自獨立的行為者，而且它們在戰略上有相當的密切性；2.三角關係構成三組雙邊關係，而任何一組的雙邊關係都會受到另兩組雙邊關係的影響；3.戰略三角關係一旦形成，任何一個行為者都會藉由與另外兩個行為者的合作或對抗來趨利避害²⁶。

除此之外，在戰略三角的分析途徑中，任何兩個行為者之間的關係是由「內在因素」（Endogenous factors）和「外在因素」（Exogenous factors）所決定²⁷。所謂的內在因素是指兩個行為者彼此在安全、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內的相互作用會對彼此的雙邊關係造成影響。內在因素因為包含了各種不同的國家利益，因此彼此之間並不一定相互一致或吻合。外在因素是指兩個行為者之間的關係受到第三者分別與這兩個行為者之間另外兩組雙邊關係的影響，其中包括三種「延伸關係」（derivative relation），延伸關係指的是本國對他國的態度是由本國和第三國之間的關係來決定。第一種延伸關係是「敵人的敵人是朋友」（即負負得正）；第二種是「朋友的敵人是敵人」（正負得負）；第三種延伸關係有兩種類型，都是關於對敵人的朋友的態度。從心裡上來說，敵人之友應該是加以排斥抵抗，但是在國際關係上冷靜計算後會有不同的結果。如果敵人之友力量薄弱，或是冥頑不靈，則適宜對之採取敵對或制裁態度，也就是「敵人的朋友是敵人」；但如果敵人之友具備相當實力，或是態度上有若干彈性，則應該加以拉攏來瓦解對手的聯盟，即「敵人的朋友是朋友」。這幾種延伸關係可以如圖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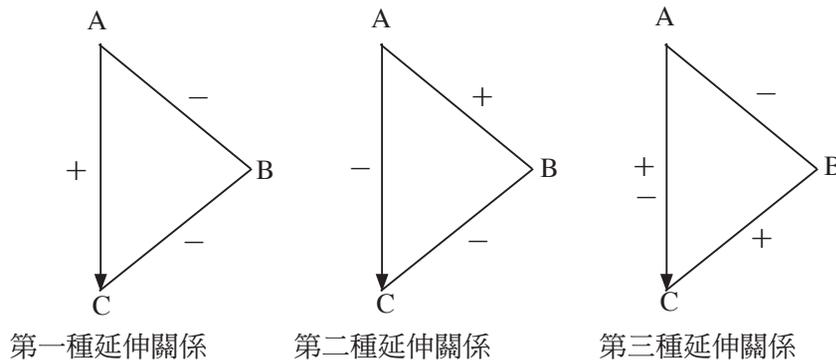


圖2 戰略三角的三種延伸關係

資料來源：吳玉山（1997）。

²⁶ Dittmer, Lowell, "The Strategic Triangle: The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33, No.4, 1981, pp.490-491.

²⁷ 同註3，頁173。

在一個戰略三角中，三邊關係就是透過外在因素對彼此產生影響。這些影響有的是加強了原有的內在因素，例如敵人的敵人原本就和我方有緊密的經貿關係；有的則是和內在關係衝突，例如朋友的敵人和我方有緊密的經貿關係。當內、外在因素相互增強或抵消之後，兩個行為者對彼此態度就可以確定，而雙邊關係的性質也就較為明朗。一般而言，內、外在因素皆同時會對決策造成影響，而兩國的「友好」(amity)或「敵對」(enmity)往往就是這兩種因素相互影響甚至抵消的後果²⁸。

討論完三角關係的延伸與內外因素的影響後，在三方的互動過程裡也有一些行動的準則必須具備，才適合運用戰略三角進行討論，這些準則包括：1.三方基本上是處於一種既合作又對抗的情況；2.己方均利於與他方合作，而不利於與他方對抗，也不利於另外兩方間之合作，但卻利於另外兩方間之對抗；3.任一方均不利於另外兩方中的一方對另一方之影響力與支配力變大，更不利於上述影響力與支配力形成一種危害到弱勢一方生存安全的情勢。

檢視完戰略三角理論的應用條件與前提假設之後，接著觀察戰略三角的理論架構及其應用上的發展。依據Lowell Dittmer²⁹將賽局的概念引入戰略三角，並將三角關係依照相互間友善及敵對之不同所做的分類，可以歸納成三邊家族(M'enage a trois)、羅曼蒂克(Romantic)、結婚(Marriage)與單位否定(Unit-veto)四種類型，其圖形分別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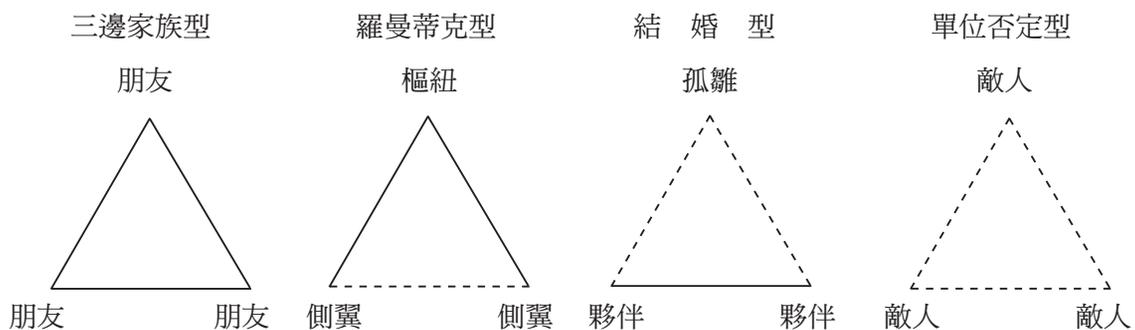


圖3 戰略三角的四種類型

說明：實線表示雙邊關係為「友好」，虛線表示雙邊關係為「敵對」。
資料來源：整理自Lowell Dittmer (1981)。

²⁸ Wu, Yu-shan, "Exploring Dual Triangles: The Development of Taipei-Washington-Beijing Relations," *Issues & Studies*, Vol.32, No.10, 1996, pp.32-38.

²⁹ 同註26，頁485-515。

三邊家族型表示三方相互間均維持友好關係；羅曼蒂克型則顯示三方中的一方同時與另外兩方保持友善關係，而後者相互間則是一種敵對的關係；結婚型則是三方中有兩方維持雙邊友好關係，而同時與第三方交惡；單位否決型則是三方間皆呈現敵對的關係。吳玉山以正負號代表三邊相互間之親善與敵對關係，將羅德明戰略三角區分為三邊為正（三邊家族型）、兩正一負（羅曼蒂克型）、兩負一正（結婚型）和三邊為負（單位否定型）的關係³⁰。而三方面因所處不同之類型而有樞紐（pivot）、朋友（friend）、夥伴（partner）、側翼（wing）、敵人（foe）和孤雛（outcast）六種角色之扮演，其優越順序為樞紐>朋友>夥伴>側翼>敵人>孤雛³¹。在這六種角色中，處於不利地位者必然會有動機調整彼此的關係以達到「提升角色」之目的。基於此，對於任何三角關係的研究，我們分析的內容是先確定彼此經由內部因素所決定的雙邊關係；再觀察外部因素和延伸關係，來決定戰略三角的結構類型與各行為者的角色；進而討論處於不利地位的行為者是否有提升角色的可能。

表1 戰略三角中的角色與優越順序

優越順序	角色	親善關係的數目	其他兩個行為者之間的關係
1	樞紐	2	敵對
2	朋友	2	親善
3	夥伴	1	敵對
4	側翼	1	親善
5	敵人	0	敵對
6	孤雛	0	親善

資料來源：吳玉山（1997：183）。

包宗和進一步將三角關係操作化，分別針對前述的六種角色計算各自的「效益得分」，以簡單的數學加總關係來表達角色的優越順序³²。在上述四種戰略三角類型中，雙邊關係如果是友善，則彼此獲得+1分，若是雙邊關係敵對，則彼此獲得-1分，這裡的+1分或是-1分是指相對位置之兩方所獲得的效益。而整個三角關係的效益得分計算方式是：自己與另外兩方雙邊效益的加總，再減掉另兩方間之雙邊效益。依據其計算方式，包宗和得到的結論是，從「孤雛」到「樞紐」依效益得分從

³⁰ 同註3。

³¹ 「樞紐」是指在羅曼蒂克型中與另兩方為正的那一方；「朋友」則是指三邊家族中的任一方；「夥伴」則是指結婚型中彼此為正的雙方；「側翼」則是指羅曼蒂克中相對於樞紐的另外兩方；「敵人」是指單位否定中的任一方；「孤雛」則是指結婚型中與另兩方交惡的那一方。可以參見圖3所示。

³² 同註2。

低到高可以分為四級，分別是：樞紐(+3) > 朋友、伙伴(+1) > 側翼、敵人(-1) > 孤雛(-3)。而根據效益的偏好，包宗和並且推論角色提升的途徑模式，以及提升過程中戰略三角的變化途徑，如圖4所示。

整體而言，戰略三角理論是依據三個行動者三方互動的情況加以描述這個結構的穩定與否。依據每個行動者都有角色提升的動機，而角色提升卻又必須視另兩造的關係而定，因此可以解釋國際關係中三方互動的過程裡既競爭又合作的特性。整合Dittmer、吳玉山與包宗和對於戰略三角的應用與分類，可以歸納出表2的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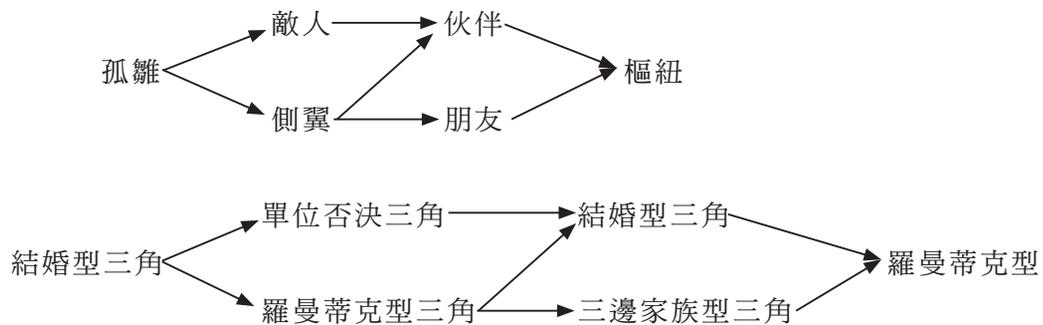


圖4 戰略三角的角色提升與類型變化的通則

資料來源：包宗和（1999：346）。

表2 戰略三角角色偏好及效益得分

三角類型 (Dittmer)	角色名稱 (Dittmer)	偏好順序 (吳玉山)	效益得分 (包宗和)
羅曼蒂克	樞紐	1	3
三邊家族	朋友	2	1
穩定婚姻	伙伴	3	1
羅曼蒂克	側翼	4	-1
單位否決	敵人	5	-1
穩定婚姻	孤雛	6	-3

資料來源：涂志堅、唐欣偉，「從總體觀點看柯林頓時期的美中臺戰略三角」，遠景季刊（第2卷第2期，2001年），頁172。

從戰略三角的理論架構出發，國內學界對於兩岸關係中的美、中、臺三角關係討論首重包宗和與吳玉山。依據他們兩人對於戰略三角理論的應用，美、中、臺三角關係的發展主要可以依據冷戰結構的存在與否而分成兩個大的時期。在冷戰時期，美中臺的戰略三角是受到美中蘇的戰略三角所制約，而且臺灣只有在小三角中

具有影響力，因此對於角色提升的努力完全受到大三角的結構所影響。吳玉山與包宗和在這個時期的分析並沒有太大的歧異，只有對於美臺斷交後，美國制訂臺灣關係法維持與臺北的關係，該如何判讀雙邊關係有不同的見解。包宗和認為臺灣關係法保障臺灣安全，即使與臺灣斷交，美臺關係仍然為正。而吳玉山則認為，美臺斷交與美中建交是臺灣在戰略三角中掉入孤雛的開始，也就是臺美關係出現由正轉負的改變。雖然如此，並不影響戰略三角在這個時期的應用與討論。

冷戰結束以後，一方面因為大三角瓦解，二方面受到臺灣與中國展開民間交流甚至半官方接觸的影響，小三角的互動出現更細緻的變化。吳玉山與包宗和分別在戰略三角的發展上討論美中臺三角關係的變化，儘管對於一些特定事件該解讀為雙邊關係的正或負有所差異，但對於戰略三角的應用而言並沒有根本上的差異。值得一提的是，吳玉山稍後提出了「非自願的樞紐」（unintending pivot）的概念，扭轉了戰略三角中「樞紐」這個角色是第一優先的論點。吳玉山認為，目前美中臺三角關係的發展上，美國雖然與臺灣、中國兩邊交好，而臺灣與中國的關係持續緊張，但受到雙方分別給予壓力的影響，而使得樞紐的地位不但沒有讓美國獲得更多利益，反而在三邊關係上出現動輒得咎的窘境³³。

參、戰略三角應用在兩岸關係上的侷限性與改良後的模型

在討論完戰略三角理論大致上的應用之後，接著對於理論本身可能的問題進行討論。由於戰略三角理論在運用上具有一些假設性的條件，以符合演繹過程的需要，而這些假設性條件成為該理論在解釋兩岸關係上時重要的挑戰。首先，戰略三角對於三個行動者的強弱大小是不處理的。但事實上，國家實力的強弱作為國際關係中重要的變數，是難以被忽視不談。儘管吳玉山認為權力不對等的情况雖然在臺、美、中的戰略三角中非常明顯，也不妨礙三邊關係的相互影響³⁴。但本文認為，權力不對等的因素即使無法扭轉相互關係的絕對價值，也會影響這些關係的連結強度，因此仍舊必須考量進來。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與中國戰略伙伴的關係更形鞏固，這是因為中國在東亞甚至全球性議題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實力，因此對於美國而言，積極爭取是其必然的趨勢。而對於臺灣而言，由於相對實力是三角關係中最薄弱的一方，因此往往無法主動的改變三角關係的均衡，只能透過雙方對臺灣的爭取來間接換取生存的最大空間。而這樣的爭取動機，對美國而言，是區域主

³³ 請參見吳玉山（2000），同前註9，頁15。

³⁴ 同註3，頁183。

導權的象徵，對中國而言，是主權完整的象徵，完全不是因為要爭取臺灣作為對抗另一方的「盟邦」。因此，戰略三角中的三方關係是基於三者權力趨於對等的情況下才能有效的演繹其結論，一旦出現權力不對等的情况，除非有其他因素支撐三者的競合關係，否則戰略三角就難以適用。

在臺、美、中三角關係中，包宗和運用戰略三角分析的方法給予量化分析，其中友善關係給+1分，而敵對部分則給-1分，用以標示相對效益，並據此推論戰略三角的角色效益是樞紐>朋友、伙伴>側翼、敵人>孤雛³⁵。本文認為，相對權力大小的差異，雖然不會改變效益排序的結構，但對三者而言，友善與敵對絕對不會帶來完全相同的效益。舉例來說，對臺灣而言，由於美國是最重要的依靠，而對美國而言，臺灣只是戰略棋子的角色，因此對雙方而言，不能以相同效益來解讀。相同的，對美國而言，與中國的友善如果給+1分，那與臺灣的友善就絕對不及+1分了。這正是相對權力大小不一致所造成的效果。雖然不會改變演繹結果的效益排序，但其間利益的落差與風險評估，卻會影響角色提升與轉換的意願。

其次，戰略三角的兩兩角色關係，是以友善和敵對來做二分。儘管吳玉山也強調，友善和敵對關係會受到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的共同影響，而內在因素更包括安全、經濟、意識形態等不同變數所左右，但在進行模型推論時，仍舊是歸結成非友善即敵對的二分關係³⁶。後冷戰時期，由於經貿全球化速度飛快，在冷戰時期的國際關係或可以友善與敵對來做絕對關係的界定，但後冷戰時期經常出現「既友善又敵對」的複雜關係，已經成為常態，而戰略三角的分析就必須在這個地方做出調整，否則難以精確討論三方互動的動態邏輯。這種既友善又敵對的複雜關係在臺、美、中三角關係中更為顯著。在經濟議題上，三方高度的互賴結構使得經濟利益上呈現三方均願意往友善的策略來移動，而彼此釋放的善意也確實讓經濟議題上彼此確實不斷在強化友善的關係。但即使如此，意識形態（包括人權、區域安全等）上，美國與中國卻出現敵對的態勢。因此，戰略三角將三方關係化約為友善與敵對兩種關係，雖然符合演繹的簡約需求，但卻難以滿足推論上的精確。

第三，戰略三角中的友善與敵對態度假設行為雙方是一致的，亦即當友善出現時，是假設雙方均對對方友善，而敵對則是雙方均對對方敵對。這樣的假設在實際案例的適用性上也出現值得討論的地方。雖然友善和敵對態度會影響彼此對對方的態度，但仍不能排除「單方友善」或「單方敵對」的特殊情況。以臺、美、中三角關係為例，由於臺灣對美國的高度依賴，因此臺灣對美國的態度保持友善是基本的

³⁵ 同註2，頁342-345。

³⁶ 同註3，頁173-177。

政策，即使美國對臺灣有態度上的變化，臺灣仍舊願意提供美國無論軍事或是經濟上的好處。再以中國對臺灣的經濟政策為例，即使臺灣做出「戒急用忍」的敵對政策，中國在經濟面向上仍舊呼籲三通、提供臺商優惠等措施，強調對臺灣經濟投資吸引的友善態度。因此，敵對與友善就出現不一致的可能，單方面的友善，甚至一方友善、一方反而敵對的可能性也存在。戰略三角的理論原型並不處理這種「單方友善／敵對」的情況，當然也出現分析上的侷限。

基於以上的討論，戰略三角的理論模式在基礎框架上絕對是適合臺、美、中三角關係的實證分析，但應用上或許可以調整細節的分析方式來解決權力不對等以及多面向的交往關係。本文認為，三角關係若用一個簡單的函數關係表示，不但能處理權力不對等的問題，也能考慮各種面向的交往權重。我們假設彼此都具有一個「友善程度」（F），而這個友善程度由彼此的「安全利益友善度」（S）與「經濟利益友善度」（E）來決定，假設安全利益中最為友善的情況為結成軍事同盟關係，而最不友善即為宣戰狀態，分別由-1與+1表示，因此安全利益友善度S的值介於-1與1之間。經濟利益方面，假設最友善為開放己方市場為對方的自由貿易區，最不友善即為經濟封鎖與制裁，與安全利益一樣，E值是介於-1與+1之間。而安全利益與經濟利益因為國際環境條件的變化或是各自關注的強度不同而可能有不同的「權重」（以「n」表示），這些權重以百分比來表示，加總後則為1（ $n, 1 \geq n \geq 0$ ），最後再加入一個殘餘值（e）表示其他可能不屬於安全與經濟利益的變數。在這些變數決定之後，將相對權力（P）作為所有關係加總後的權重（ $1 \geq P \geq 0$ ），用以強調權力大小在彼此友善程度上的影響力。彼此的關係就呈現下列的線性關係：

$$F = P*[nS + (1-n)E + e]$$

這個線性函數的關係式，同時考慮權力因素、安全因素、經濟因素之後將彼此的友善程度量化，可以強調其友善的強度，也可以分別計算三方各自對對方的態度。必須強調的是，式子裡的數字只是強調在這一組戰略三角關係中的相對強度而非絕對數字的意義。我們將「美國對臺灣的友善程度」以 F_{UT} 標示，臺灣的相對權力權重以 P_T 標示，美國對臺灣的安全友善度以 S_{UT} 標示，而經濟友善度則為 E_{UT} ，而對臺灣的安全友善加權值標示為 n_{UT} ，最後，影響美國對臺灣友善程度而不屬於安全與經濟議題的變數標示為 e_{UT} 。因此，這個關係式如下表示：

$$F_{UT} = P_T*[(n_{UT}*S_{UT})+(1- n_{UT})* E_{UT}+e_{UT}]$$

相同的方式我們將美國對中國的友善程度以以下關係式表示：

$$F_{UC} = P_C * [(n_{UC} * S_{UC}) + (1 - n_{UC}) * E_{UC} + e_{UC}]$$

而中國對美國的友善程度，以及對臺灣的友善程度分別為：

$$F_{CU} = P_U * [(n_{CU} * S_{CU}) + (1 - n_{CU}) * E_{CU} + e_{CU}]$$

$$F_{CT} = P_T * [(n_{CT} * S_{CT}) + (1 - n_{CT}) * E_{CT} + e_{CT}]$$

臺灣對美國的友善程度以及對中國的友善程度則為：

$$F_{TU} = P_U * [(n_{TU} * S_{TU}) + (1 - n_{TU}) * E_{TU} + e_{TU}]$$

$$F_{TC} = P_C * [(n_{TC} * S_{TC}) + (1 - n_{TC}) * E_{TC} + e_{TC}]$$

因此，戰略三角彼此友善程度成為六個函數所構成，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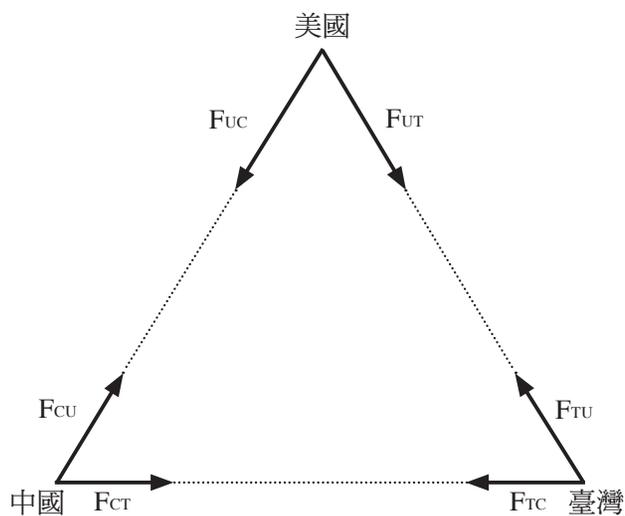


圖 5 戰略三角下的彼此友善程度與認知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這個模型可以將戰略三角的分析進一步細緻處理，特別是將彼此的關係以一組連續變數表示，而不是名目變數，有助於更接近現實的分析與比較。此外，這個改良後的模型也將戰略三角的三邊關係轉換成六組關係，更符合現實上單邊依賴或是單邊友善的事實。不僅如此，由於是以函數關係處理變數的相對關係，因此可以依據事實的演進、單一事件或偶發事件來隨時調整相對數字的大小，對於解釋友善與敵對的態度而言，較能存在比較的空間，而非只是單純的二分法處理。

肆、改良模型下的美、中、臺三角關係

討論過改良的模型之後，我們將美、中、臺三角關係實際的運用這個改良的模型來加以分析。首先，對於三個國家的相對權力大小而言，依據Cline所提出的綜合國力計算公式³⁷，美中臺的綜合國力評比其排序是非常清楚的。美國方面，雖然國土面積比中國的面積要略小，但就經濟能量、軍事能量而言，美國卻比中國、臺灣要來得強大，加上意志貫徹與策略目標明確，使得美國的相對權力不僅是美中臺三者之間居冠，更可以說是世界各國之首。在中國部分，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後使經濟迅速成長，儘管在一些指標上或許還沒有超越臺灣，但以經濟能量而言確實是比臺灣優越，更遑論軍事能量與國土面積都遠優於臺灣。而其共黨專政下的意志貫徹與策略目標也都明顯比臺灣來得強，因此在三角關係中居次的地位也無庸置疑，甚至已經逐漸縮小與美國之間的差異。以綜合國力而言，臺灣僅能在經濟能量上保持與中國抗衡，不論是國土面積、軍事能量都遠不如中國，而臺灣內部的統獨爭議、國家定位的不明確，更使得意志貫徹與策略目標也大打折扣。因此，就綜合國力而言，三者的排序關係是： $P_U > P_C > P_T$ 。

在安全友善度的彼此關係上，三邊的六組關係可以大致區分為美、臺的保護—依賴關係；美、中的嚇阻—抗衡關係；以及中、臺的威嚇—防禦關係。而彼此的友善程度也大致明朗。在美、臺方面，臺灣長期以來不只對美國友善，甚至存在一種依賴的關係，不但依賴美軍對中國的嚇阻力量，也依賴美國對臺灣的武器販售³⁸。因此，在六組安全友善度上，臺灣對美國的安全友善度是最高的。其次則是美國對臺灣的安全友善，這是因為對美國而言，臺灣不但不是敵人，甚至是一個在戰略

³⁷ 依據Cline的衡量公式，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 $P_p = (C + E + M) \times (S + W)$ ，也就是國力 = (基本體積 + 經濟能量 + 軍事能量) × (策略目標 + 貫徹意志)。See, Cline, Ray S. *World Power Assessment: A Calculus of Strategic Drif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1975.

³⁸ 以近日沸沸揚揚的軍購案為例，臺灣向美國購買防禦性武器不僅是單向依賴，金額更十分龐大。因此在安全友善方面，不僅是最無威脅，甚至可以說是對美國的依賴。

與國家安全考量上提供保護的對象，只要臺灣維持與美方一致的利益，自然不會降低對臺灣友善的程度。第二組的美、中關係上，儘管美國仍以中國為主要的假想敵人，但九一一之後美國的反恐戰略，加上北韓問題懸而未決的情況下，美國是積極保持與中國的「戰略伙伴關係」，希望在國際議題上得到中國的支持，或至少不是反對美國的力量³⁹。因此雖然在亞太的戰略布局仍以中國為假想敵，但單方面的友善程度在六組雙邊關係中仍可以視為僅次於臺灣對美國以及美國對臺灣之後。而中國對美國的安全友善相較於美國對中國則略低，這是因為中國以和平崛起為口號，在國內民族主義興盛下⁴⁰，中國積極介入世界秩序的影響，力圖表現大國政治，在軍事上與美國的抗衡也急起直追，對美國而言也構成一定的威脅。至於最後中、臺的兩組關係方面，臺灣的國防因為已經從「反攻大陸」轉換為「防禦固守」的戰略，在防禦性為主的國防架構下，對中國的安全友善還比中國對臺灣要略高。最低的安全友善當然是來自中國對臺灣，中國不僅堅持不放棄「武力犯臺」的可能性，更逐年增加瞄準臺灣的導彈⁴¹，而軍事演習或飛彈試射，也處處以臺灣為假想的侵略目標，因此安全友善度可以說是六組關係最低的一組。不僅如此，中國與臺灣不但不是戰略伙伴的關係，更是彼此軍事威脅的來源，因此在數值上可以理解為由正值變為負值。基於此，安全友善的六組關係便呈現以下的順序：

$$S_{TU} > S_{UT} > S_{UC} > S_{CU} > S_{TC} > S_{CT}$$

在經濟友善度的彼此關係上，友善程度最高的一組關係應該是中國對臺灣的經濟政策。這是因為改革開放以後，在和平統一的基調上，「以商圍政」是重要的政策之一，而具體的表現就是積極提供各種優惠吸引臺商赴中國投資⁴²。這樣的策略

³⁹ 2000年小布希政府上臺後，國務卿包威爾在訪問中國時就曾指出，美國不把中國看成敵人，放棄使用「戰略競爭者」來定位美、中關係，並積極建立雙方「富有成效」而且「向前看」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則建立在朝鮮半島穩定、防止武器擴散與貿易關係發展的共同利益之上。請見梁建斌、梁志華、柳豔，*從美國調整政策看中美臺三角關係的前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1年），頁12。

⁴⁰ 鄭永年認為，中國新一波民族主義出現，受到西方強調「中國威脅論」的影響，連帶使得中國民族主義從向西方學習變成向西方說不的轉向，請參見鄭永年，同前註23，頁381-382。而1999年美國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更激起一波反美的民族主義浪潮，請參見Chu, Yun-han,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Prospec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44, No.4, 2004, p.490。

⁴¹ 依據美國國防部報告，中國部署東南沿海的飛彈每年以50-75枚速度增加，預估2005年時總數就可以達到650枚。而中國的彈道飛彈雖不是臺灣的唯一威脅，但卻是迫切與直接的威脅。請參見林正義，「導彈防禦與非擴散問題對亞太安全之影響」，收錄於陳一新主編，*美中臺關係戰略評估2004*（臺北：遠景基金會，2004年），頁26。

⁴² 1988年中國發布實施「國務院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內容賦予臺灣投資者比僑外投資更優惠的條件。請參考吳玉山，同前註3，頁135。

不僅有政治考量，也有刺激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在內，也就是希望透過鼓勵臺商投資，刺激經濟交流，以達成「以經濟促進統一」與「發展國內經濟」的兩項目標。而從臺灣出口到中國的比例與金額來看，也確實看見中國對臺灣經濟友善的影響。在1986年，臺灣對中國出口的金額占總出口值2%，金額大約為9億美元。到了2000年，出口總值已經高達188億美元，占總出口值17%⁴³。因此，中國對臺灣的經濟友善度在六組關係中而言可以算是最佳的一組。其次，美國在2000年由柯林頓總統主導下，參、眾兩院分別通過給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PNTR）的法案，也就是在中、美建交後逐年表決的「最惠國待遇」，不僅改善對中國的經貿關係，也協助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使得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友善度向前跨越一大步⁴⁴。再其次，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以經濟發展為統治正當性來源的前提下，積極吸引外資進入中國市場，而提供外資在中國投資的環境也是連年改善，這其中當然也包括美國，因此相對於美、臺；臺、美或是臺、中，這組的友善度算是相對較佳的。接著是臺美與美臺的雙邊經貿關係，在臺灣積極推動「臺美自由貿易」（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之下，臺、美的雙邊經貿關係持續向前推進，而美國基於政治、經濟、戰略、價值等的因素考量下，也認真評估與臺灣建立自由貿易的可行性⁴⁵。雖然如此，相較於臺灣的積極推動，美國仍將FTA視為達成其他目標的一個籌碼，例如要求改善智慧財產權或甚至要求臺灣確保兩岸現狀的維持。因此，臺灣對美國的經貿友善仍比美國對臺灣要略高。六組經貿友善關係中最差的一組自然是臺灣對中國的經濟友善。受到安全因素的考量，臺灣對於臺、中經貿交流而言可以說是戒慎戒懼，不僅在李登輝總統時期制訂「戒急用忍」政策，到了陳水扁總統時期仍舊對於開放赴中國投資多所設限。儘管在市場壓力下，已經有所開放與進展，但就國與國正常的經貿關係而言，仍舊是限制大於開放⁴⁶，甚至可以理解為負值。彼此大小順序如下所示：

⁴³ 同註22，頁47-48。

⁴⁴ 為此，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還特別以熱線電話和柯林頓通話長達四十分鐘，以表達對美國此舉的謝意。關於柯林頓積極推動該法的通過過程，請參考裘兆琳，同前註7，頁37-80。

⁴⁵ 關於美國對其他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協定的考量，請參考洪德欽，「臺美自由貿易協定之策略分析」，*國策專刊*（21期，2002年），頁26。

⁴⁶ 吳玉山就認為，臺灣對於兩岸經貿往來的態度是主張「來緊去鬆」的「單向、間接」交流，主要是基於臺灣對於兩岸政治統合的巨大成本，因此堅持在經濟上交流的嚴格管制，請參閱吳玉山，同前註3，頁157。冷則剛則認為，在兩岸經貿交流上，臺灣因為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的矛盾而呈現政經雙軌發展的現象，與中國大陸最不同之處在於，促進經貿交流的動力在民間而非政府。因此可以得知，臺灣面對兩岸的經貿交流有著比中國大陸更複雜計算邏輯，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國家安全，而且甚至可能與經濟利益相互衝突，請參閱冷則剛，同前註10，頁243-244。

Ect> Euc> Ecu> Etu> Eut> Etc

在安全友善的權值上，可以先比較三個國家在國家安全議題與經濟利益議題上的相對比重。其中，臺灣面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國家安全的考量不但凌駕於經濟利益之上，而且比重也遠高於經濟利益的追求。其次，對美國而言，蘇聯的瓦解一度使得國家安全的議題在軍事威脅的層面上獲得舒緩，但在九一一之後，安全的威脅來源從國對國之間轉變成各種可能，迫使美國對於國家安全的議題再度給予高度的重視⁴⁷。至於在中國方面，當然國家安全的利益也是給予高度重視，從連年提升的國防預算以及積極提升高科技戰備與發展戰術導彈可以得到證實。但對共產黨政權而言，維持統治中國的正當性最主要還是在於尋求經濟的成長。而且中國知道，在美中臺三角關係中，美國和臺灣主動先發制人以軍事力量對中國展開第一擊其機率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對中國而言，儘管國防安全也備受重視，但相對於臺灣與美國可以說是較低的一個。

比較過美、中、臺對於安全議題重視的相對排序後，再仔細比較彼此的雙邊關係。對於最側重國家安全的臺灣而言，中國的軍事威脅是直接影響國家安全的最大議題，因此對中國的安全權值最重。而美國提供的軍事協助可以說是臺灣存續的關鍵，因此對美國的依賴性安全權值次之。美國方面，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對安全議題重視程度迅速提高，在反恐的議題上決定長期布局，其中中國扮演亞太地區的強權角色，又是美國潛在威脅來源，因此成為美國亟欲爭取的對象。許志嘉、許湘濤認為，在「建設性合作關係」之上，美國對中國關係的政策包括穩定建設性合作關係、爭取中國支持反恐、以及維持一中與對臺安全承諾。而彼此高層交流的次數增加、軍事合作的開啟更顯示美國拉攏中國的積極態度⁴⁸。因此美國在安全議題的權重上，對中國的權值也是很高的⁴⁹。在中國方面，雖然經濟發展與軍事安全都

⁴⁷ 比較柯林頓政府在1995年的「國家軍事戰略」、1997年的「四年期程國防檢討」以及布希政府在九一一之後的「四年期程國防檢討」可以發現，美國對於安全的對策從過去的消極維持現狀與穩定，變成後來的積極介入與強勢，顯見美國對於國土安全、人民安全的重視受到九一一而大幅提升。請參見黃奎博、蘇紫雲，「『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全球戰略之調整」，收錄於中華歐亞基金會、改革開放論壇聯合研究報告，**反恐戰後的美中關係與臺海情勢**（臺北：大屯出版社，2003年），頁37-38。

⁴⁸ 請參考許志嘉、許湘濤，「『九一一事件』後美國與東亞大國關係的發展」，收錄於中華歐亞基金會、改革開放論壇聯合研究報告，**反恐戰後的美中關係與臺海情勢**（臺北：大屯出版社，2003年），頁79-90。

⁴⁹ 邵宗海就認為，九一一事件是美國制訂中國政策重要的轉折，因為九一一事件使得美國對中國威脅論的關心轉移成對恐怖主義的防堵，不但如此，美國也需要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支持以減低處理國際事務的成本。請參考邵宗海，同前註16。

很重要，但中國知道，美國不會主動挑釁中國的國防安全，但確有能力在經濟議題上威脅中國，而經濟議題也是支撐共產黨統治中國的重要支柱。因此，相較於前面三組，中國儘管也以美國為軍事發展的追逐目標，但安全的權值上直接影響中國安全的比重略低於前面三組。最後的兩組關係分別是中國對臺灣以及美國對臺灣的安全權重考量。這兩國對臺灣的安全權重之所以最低，主要是在於現階段中，臺灣在三角關係中以軍事力量改變穩定的能力最低。不僅如此，臺灣的軍事力量在三角關係中也是最薄弱的一個。在動機與能力均不高的情況下，來自臺灣主動的軍事威脅自然也相對最低。而兩組相互比較下，美國對臺灣的權重又因為臺灣的依賴關係而更低於中國對臺灣的安全權重。因此，六組安全權重的排序便如下所示：

$$n_{TC} > n_{TU} > n_{UC} > n_{CU} > n_{CT} > n_{UT}$$

最後一組變數是影響彼此友善度但不屬於安全與經濟議題的變數。這個部分由於影響均極為細微，因此我們僅考慮美國會考量中國的人權問題而給予負分，中國也因為相同因素而會有一樣強度的負面考量，但影響彼此友善與否的程度是很小的。其他對於臺灣的影響均極為細微，在模型中選擇不予考慮。至此，我們可以進一步進行三角關係中彼此友善程度的相對比較。

在臺灣和美國的關係方面，因為 $P_U > P_T$ ，且 $S_{TU} > S_{UT}$ 、 $E_{TU} > E_{UT}$ ，因此無論 n_{TU} 與 n_{UT} 的關係為何，都可以證出 $F_{TU} > F_{UT}$ ，而因為 P_T 值在相對關係中遠低於 P_U ，因此加權之後 F_{TU} 將遠大於 F_{UT} 。這個結果意味著臺灣對美國的友善程度遠大於美國對臺灣的友善程度。事實上，在後冷戰時期這個趨勢就已經日益明顯，因為蘇聯的瓦解，使得美國在東亞的區域權力均衡上需要加強與中國的合作，因而往中國傾斜的趨勢顯著，迫使臺灣更加深對美國依賴的危機感，也迫使臺灣不斷釋出對美國的善意，或是希望獲得美國更多明確的保障宣示，希望穩定與美友好的雙邊關係。因此，在臺、美關係上呈現一種美國在兩岸的槓桿上往中國傾斜、而臺灣則增加往美國傾斜的趨勢。

在中國與美國方面則有著微妙的關係。雖然 $P_U > P_C$ ，但在 $S_{UC} > S_{CU}$ 、 $E_{UC} > E_{CU}$ 的情況下，兩者的友善程度呈現相去無幾的情況。在這種情形下，任何一個變數的變動都可能改變友善程度的相對強烈關係。而這裡呈現的趨勢是，當中國的相對權力越接近美國，美國對中國的友善程度就越高；而因為美國比中國更偏重安全議題，中國則是比美國偏向經濟議題，因此兩邊的友善程度分別由不同議題扮演不同關鍵的變數。對美國而言，中國調整安全友善策略的影響，將使美國對中國友善度的改變大於中國調整經濟策略後的影響。而中國則剛好相反，對中國而言，美國調

整對中國的經濟友善策略，影響恐怕不低於美國調整安全策略。由於在整組戰略三角中，美國與中國的各项變數都是在六組排序的中位附近遊走，差異都不大，因此雙方對彼此的友善程度受到相對權力的加權影響就變得較顯著。隨著中國崛起的趨勢持續明顯，美國對中國的友善程度也持續強化，而隨著中國對經濟成長的持續依賴，而美國對於經濟議題的影響能力又甚高，因此中國對美國的友善程度也是呈現成長的趨勢，即使兩邊的友善度已經有所交集，雙方仍舊會朝向繼續強化對彼此友善的方向前進。

最後一組是臺灣與中國的關係，這一組關係也出現較為複雜的情況。在安全議題和經濟議題上，臺灣都對中國採取敵對態度，加上 P_C 的值在相對關係中遠大於 P_T ，因此不但 F_{TC} 的數值為負，而且強度都極為顯著。對中國而言，雖然安全上採取敵對，但經濟採取友善，加上對經濟的加權值大於安全，因此變數抵銷之後外顯的現象呈現對臺灣的敵對態度低於臺灣對中國的敵對態度。更重要的是，由於臺灣在相對權力中遠低於中國，因此整個強度無論正或負都變得很薄弱。這顯示在戰略三角關係中，因為臺灣力量的微弱，即使對中國有著高度的敵意，中國也無懼於此，而在戰略三角的關係中努力經營與美國的關係。事實上，中國在這個方面也已有所認知，經由華盛頓解決兩岸問題可能比直接對付臺北更有效率⁵⁰。因此，中國在處理兩岸問題上，從以往直接針對臺灣也調整為尋求在美國方面的突破。基於以上的討論，三者的戰略三角再加入不同變項後呈現的六組關係便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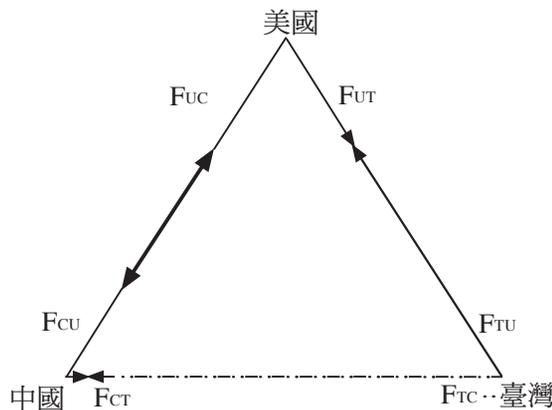


圖6 加權與計算各種變數後的戰略三角關係

說明：「——→」表示友善態度，「- - - - -→」表示敵對態度，長度表示強度趨勢。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⁵⁰ Chu指出，美國與中國在處理兩岸問題上的準則上，美國仍堅持和平並尊重臺灣人意願是處理兩岸問題的原則，而北京則認知到對臺工作的核心其實不在臺北，而是華盛頓。請參見Chu，同前註40，頁494。

由上圖以及函數的關係我們知道，受到臺灣相對權力過於薄弱的影響，中國及美國無論是對臺灣採取友善或敵對的態度，趨勢都不會太強，這最主要是受到權力不對等的影響，使得即使爭取臺灣加盟，或是與臺灣彼此敵對，其影響都遠遜於中國與美國直接交手的效益。換言之，在權力不對等的影響下，這一組的三角關係中，美國和中國都不會花太多成本來處理對臺關係，而是直接處理雙邊關係，即使對臺政策有所調整，可能也只是為了向另一方做一些間接的態度表示。除此之外，基於中國的崛起，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也逐漸朝向彼此均強化友善的趨勢發展，對美國而言是基於安全考量，而對中國而言，除了安全考量之外很大的成分也是基於經濟因素。

伍、結論—臺灣的角色提升

從傳統的戰略三角中，三角關係無法辨別六組關係的個別情況，因此只能以三個符號來表示彼此的關係。不僅如此，三角關係也無法比較個別的強弱，只有類別上的差異。本文提出的改良式戰略三角，主要是希望針對這兩個盲點加以補充，希望能增加理論解釋上的廣度和範圍。改良後的戰略三角模型有幾個特徵，首先，新的模型以六組關係來呈現三角關係，能夠處理彼此矛盾或強弱不一致的單邊關係，而不是以一個符號來決定兩兩關係。換句話說，當雙方出現「單邊友善」或「單邊敵對」時，改良後的模型能夠把這種現象表示出來，而這是傳統的戰略三角所無法表示的現象。其次，改良的模型保留了議題決定的彈性，儘管本文是以軍事安全和經濟利益來作為分析的變數，但這並不表示決定兩國友善與敵對的關係就僅此而已。換句話說，函數中的變數可以依據研究的需要或是現實條件的變遷而做調整。第三，模型中以函數處理雙邊關係可以凸顯其強弱不一致的差異比較，尤其是處理角色之間大小不一致的影響。在本文的分析中，三邊的六組關係各自有其強弱差異，而相對權力的大小差異也能在新的模型中討論其影響力，這也是傳統的戰略三角所無法討論的問題。最後，對於戰略三角延伸討論的角色提升問題，新的模型也能提供更動態也較為直接的討論。傳統的戰略三角討論角色提升時也是基於三組關係的變化而來，但新的模型則能討論角色提升的過程和各種途徑。以下再以本文所討論的美、中、臺三角關係為例，以臺灣的角度探討角色提升的可能，並作為本文的代結論。

對於臺灣而言，爭取在戰略三角提升效益的途徑有兩個。第一是使美國與中國對臺灣的友善程度均做提升，也就是在模型中設法提高 F_{UT} 與 F_{CT} 的數值。第二個方

法是降低美國與中國對彼此的友善程度，也是降低 F_{UC} 與 F_{CU} 的數值。在提高 F_{UT} 與 F_{CT} 的數值上，可以經由以下三種方式達成。首先，增加臺灣自身的相對實力，也就是提升 P_T 的值。由於彼此的相對實力具有決定友善程度的加權效果，因此提升自己的實力是設法在戰略三角中取得更為優越位置的首要方式。其次，在對美國而言（ F_{UT} ），加強在安全議題上提供美國的支持將比加強在經濟議題上提供美國支持更能換取美國提高對臺的友善程度。基於美國在九一一之後對於安全議題的重視，臺灣在安全議題上施力將比在經濟議題上施力更容易影響美國的態度的。例如滿足美國在軍事利益上之所需，或是盡量在亞太地區扮演維持穩定的角色，或至少不成為現階段美國軍事布局上的包袱等。第三，對中國而言（ F_{CT} ），加強在經濟議題上提供中國的支持，將比加強在安全議題上避免與中國的衝突，更能換取中國提高對臺的友善程度。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對於經濟穩定成長的需求一直是領導人穩定政權的根源，在中國不斷吸引臺商進駐投資的策略下，臺灣對中國的經濟限制若能放寬，將更有助於資金與技術往中國植入，也能使中國提高對臺灣的友善程度。例如放寬臺商赴中國投資的限制，或是調整三通策略等。當然，以上的三個策略是建立在沒有其他因素干擾下所演繹出的結論。至於降低美國與中國彼此友善的方面，雖然也是提升臺灣效益的途徑，但事實上並不容易做到，而且成效也不如直接爭取美國與中國的對臺友善。在模型的演繹過程，臺灣也很難直接介入美國與中國的雙邊關係，至多在兩岸議題上製造中、美兩國更多的摩擦機會以降低中、美彼此的友善程度。這也是許多討論中、美關係的學者甚至是官員認為臺灣是影響中、美關係持續深化的關鍵變數原因所在⁵¹。

本文以改良的戰略三角模型提出戰略三角分析上一些值得更細緻、更動態也更多樣的應用方式，並以美、中、臺為例實際操作戰略三角的討論。希望能對戰略三角的理論應用上達到些許補充的功能。

⁵¹ 例如2004年12月10日，美國共同電視臺（PBS）主持人查理·羅斯採訪了即將卸任的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奇時，阿米塔奇公開表示「臺灣是中美關係中最大的一顆地雷」。顯見對美國而言，繼續經營對中國的關係時，臺灣有足夠能力扮演第三者的攪局角色。